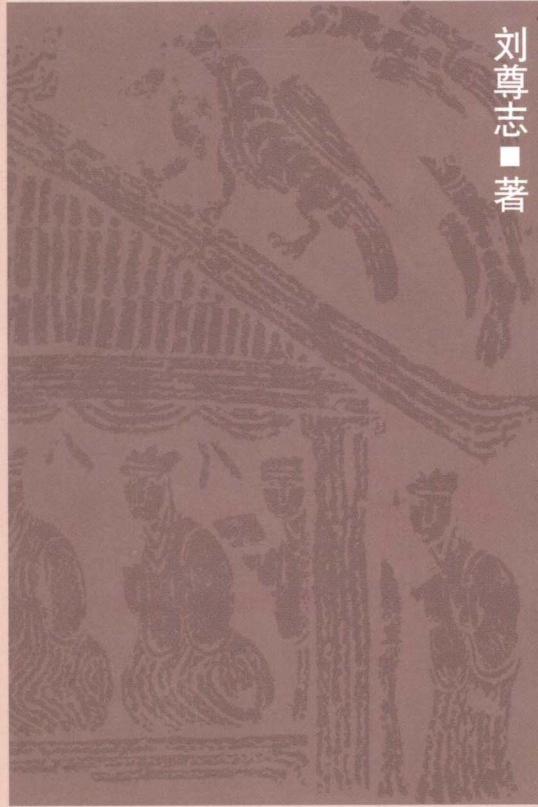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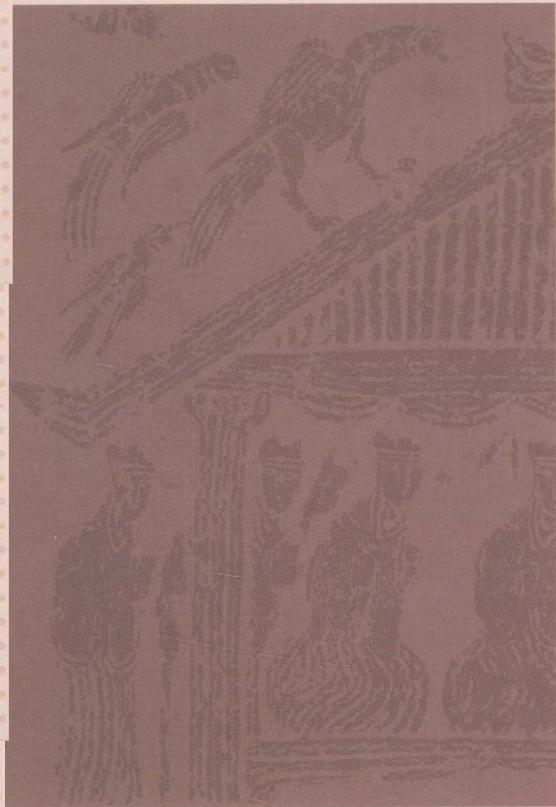


「考古学与中原文化」研究丛书之三

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

科学出版社



刘尊志 ■ 著

“考古学与中原文化”研究丛书

徐州汉墓与汉代 社会研究

刘尊志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发现、发掘的徐州汉代墓葬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对徐州地区的汉代墓葬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考古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以墓葬为参考，详细探讨了徐州地区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及物质生活面貌等诸多内容，并对徐州汉代地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反映出多元一体的汉文化特征及内涵。

本书适合于从事历史、考古、文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院校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 / 刘尊志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

(“考古学与中原文化”研究丛书；3)

ISBN 978-7-03-031580-9

I . ①徐… II . ①刘… III . ①汉墓 - 研究 - 徐州市②社会发展史 - 研究 - 中国 - 汉代 IV . ①K878.84②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413 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 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美光制版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 × 1092 1/16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印数：1—1 200 字数：455 000

定价：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
郑州大学“十五”“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考古学与中原文化”资助

“考古学与中原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韩国河

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星光 安国楼 许俊平

张民服 罗家湘 徐正英

韩国河

总序

考古学是一个常挖常新的学科，它的魅力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一件件实物或者一个个遗迹单位去透视古代先民内心深处的灵动。郑州大学地处中原，先天赋予了考古学科成长及发展的天时地利，从1976年设立考古专业，许多先辈和教师们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劳动。屈指算来，经郑州大学师生发掘过的遗址已有三十多处，其中郑州小双桥、孟津妯娌、鹤壁刘庄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尤其是，由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编写的《豫东杞县发掘报告》一书，已成为先商文化研究的一个硕果。

自2000年以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师生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二是与相关文物考古单位合作发掘。前者的发掘又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纯粹的教学实习发掘，如新乡李大召遗址和登封南洼遗址的发掘；一个是配合“三峡”、“南水北调”等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发掘。而后的发掘主要是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共同发掘了郑州西北郊的蒋寨和娘娘寨遗址等。通过发掘和整理，《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等得以出版，成为相关考古研究的必读资料。

值得总结的是，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郑州大学考古学科的发展得到了巨大支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除学科自身的造血功能外（即学科老师在郑州大学学位点博士毕业），田野考古及博物馆学的教师梯队分别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博士、硕士毕业生中得以补充，陶瓷、冶金等科技考古方向的教师也能够快速成长；二是考古学科表现出自己鲜明的中原特色和优势，既有对中原地区古代都城、陵墓和陶瓷、金属器以及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有对中原考古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律与模式的深度探讨；三是构筑了大中原考古及文化遗产学科的研究平台，许多教师在进行传统考古学研究的同时，也开展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研究，尤为可喜的是文化遗产学的介入，将古代与现代的科学思想元素融为一体，而基础医学、核物理学、冶金学、材料学等自然科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更加彰显出考古学科的强劲凝聚力；四是培养出一批具有扎实考古功底的高级人才，这些毕业生奔赴于文物、考古、博物馆、管理、教学、科研等行业的第一线，成为郑州大学考古学科生命的持续和延伸。

郑州大学考古学科的根本在中原，“中原考古”既是一个区域考古的划定，也是一个具有无比丰富内涵的学科概念，更是一个与“中原经济区”相匹配的战略课题之一。郑州大学的考古学人今后有责任和义务对此进行深入认识和研究，这些认识和探索不仅仅停留于教学与科研相长的田野发掘，也不在于一城一池、一文一字的释读，更重要的是发挥“古为今用”的传统，让古老的中原文化遗产在保护研究的前提下，发挥出更多

更大的社会能量和功用。

这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几部著作中，既有博士论文，也有考古发掘报告，每一部著作毫无疑问都凝结了作者“十年寒窗”的心血，也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郑大考古学科的特点和优势。著作的出版，得益于郑州大学“十五”“211”三期学科建设项目“考古学与中原文化”的支持，作为项目负责人，在这里追溯历史、总结经验，更想表达一种今后学科建设的理念。

“考古学与中原文化”项目的实施，旨在推动中原考古的探源、中原文明的解析和中原文化现代化的研究。河南省是文化和文物大省，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中原经济区”战略的确立和实施，中原考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和地方对高素质的考古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充分挖掘中原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发展历史学、考古学及相关交叉学科体系，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河南省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这一目标也符合郑州大学建成区域示范性、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的努力方向。

“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是为序。

韩国河

2011年2月26日

序

汉墓是汉代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但要全面梳理研究全国已发掘的几万座汉墓，尤为繁难；更兼汉代幅原辽阔，在大一统前提下的不平衡和地域特色的存在，往往使研究者望而浩叹。因此选取区域性汉墓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研究区域的汉代社会发展面貌，无疑更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意义。

选择研究的区域性汉墓应能够完整地体现区域汉墓乃至区域的汉代社会发展进程，徐州就是这样的典型地区。数量上徐州已发掘的汉墓数量达一千多座，这些汉墓的时代两汉绵延不绝。形制方面从西汉的规模宏大的横穴式大型岩洞墓、竖穴岩坑大型券顶墓、竖穴岩坑（洞室）墓和石椁墓，到东汉黄肠石墓、画像石墓（壁画墓）、砖石混砌墓、砖室墓乃至土坑墓等。形制的类别丰富而又全面，发展序列非常完整，演变规律脉络清晰。徐州历年已发现或发掘西汉楚王（后）陵墓、列侯翁主及其他刘氏宗室墓近30座；东汉彭城王和下邳王陵墓、列侯级墓葬和彭城相墓葬近10座。在汉代帝陵尚未发掘的今天，诸侯王以降的墓主身份和等级无疑对于研究区域社会等级、全面反映汉代各阶层的社会结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汉墓能客观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但考古学并非仅仅是唯物的，研究遗物本身只是方法和手段，其终极目的是客观、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徐州在汉代历史地位非常特殊，大量汉墓和较丰富的史料具备二重证据研究的基础。两汉时期，徐州为楚国和彭城国的都城，《史记》、《汉书》等史籍有相关历史的记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略可梗概。徐州西汉大型岩洞墓本身以及陵墓内出土的大量遗物，反映出当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百工技艺的高度发展。东汉时期画像石内涵极其丰富，从天界神话、人间的现实生活和对死后冥界的祈求，无所不包，完全可以说是一部直观的汉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如果仅及于此，对徐州汉墓及其所反映的徐州汉代社会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汉代徐州和汉代整个社会的关系，徐州对汉初社会和尤其是对长安的关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邦建立汉王朝，丰沛集团以萧何、曹参、周勃、夏侯婴等为代表的将相级人物多达十数人，刘邦在洛阳南宫定元勋功臣18侯中，有10人为丰沛籍，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余8人中有3人原籍非薛即砀，这还不算客居下邳的张良。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刘邦为慰太上皇故乡之思，“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这些都表明汉代今徐州一带和汉代的关系不仅仅是区域和全域的关系，也有在大一统前提下局部对全局产生较大影响的关系，特别是徐州对汉初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徐州汉墓和汉代社会的研究在区域性汉墓研究

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因此，将徐州汉墓和汉代社会作为课题研究，选题本身即具有较高的学术视野。

徐州汉墓发掘报告的系统整理出版仍需假以时日，但专题研究须臾未尝停顿。尤其是在高校的同志，已有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出版。刘尊志同志在徐州从事考古工作凡十五年，勤奋钻研，思路活跃，具有丰富的汉墓发掘和研究的积累。因此《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既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的专著，实质上也是工作和攻读学位期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总结。当然，书中的有些学术观点仍可进一步探讨，但该书资料集徐州汉墓考古之成，无疑将成为徐州汉墓考古的奠基之作。

《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即将面世，作为曾经的同事和现在的同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是为之序。

李银德

2010年12月2日

目 录

总 序	(i)
序.....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徐州地理概况与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徐州汉墓的发现与研究现状	(3)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及理论、方法.....	(10)
第四节 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本书的主要内容.....	(13)
第二章 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	(19)
第一节 徐州两汉封国概况.....	(19)
第二节 徐州西汉诸侯王（后）墓葬及陪葬品等分析	(23)
第三节 徐州西汉楚王墓墓主推测.....	(39)
第四节 徐州西汉诸侯王墓与西汉帝陵及其他地区诸侯王墓比较研究.....	(49)
第五节 徐州地区横穴崖洞墓相关研究的一些补正.....	(53)
第六节 徐州东汉诸侯王墓研究.....	(55)
第三章 徐州地区中小型汉墓形制与典型陪葬品的考古学研究.....	(67)
第一节 徐州中小型汉墓形制分析.....	(67)
第二节 徐州中小型汉墓出土典型器物的类型学研究.....	(82)
第三节 徐州汉墓的分期与年代推断	(104)
第四节 徐州汉墓的区域性特征及与周边地区汉墓的关系	(115)
余论	(119)
第四章 徐州汉墓体现的政治内容	(126)
第一节 徐州汉代政治在墓葬中的总体体现	(126)
第二节 管理机构	(130)
第三节 社会制度	(134)
第五章 徐州汉墓反映的社会思想	(156)
第一节 儒家思想	(156)
第二节 宗教思想	(161)
第三节 丧葬思想	(166)

第六章	徐州汉墓展现的经济发展	(179)
第一节	汉代墓葬展现的徐州汉代经济概况	(179)
第二节	稳定发展的农业	(181)
第三节	多种门类的手工业	(186)
第四节	繁荣多样的商业	(211)
第七章	徐州汉墓呈现的物质生活面貌	(222)
第一节	服饰	(222)
第二节	饮食	(227)
第三节	居住	(229)
第四节	交通	(236)
第五节	徐州汉代经济、物质生活水平等发展的制约因素	(240)
第八章	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相关问题研究	(246)
第一节	徐州汉墓的修建及相关问题	(246)
第二节	徐州汉代陪葬墓、陪葬坑与相关社会内容	(262)
第九章	徐州汉代地域文化探讨——以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为参考	
		(279)
第一节	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279)
第二节	徐州汉墓体现的地域文化内容及其特征	(281)
第三节	徐州地区汉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286)
结语		(291)
参考书目		(293)
后记		(303)
Abstract		(305)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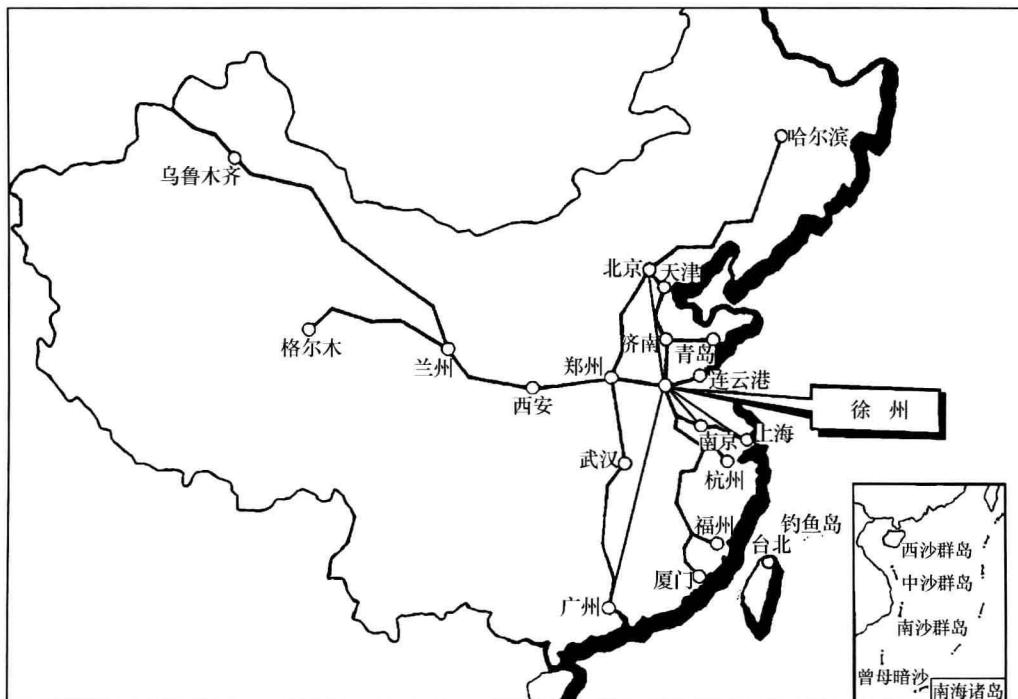
墓葬是盛放尸体或其部位的场所和置放方式的统称，墓是场所，葬是方式、方法及与其相关的内容。从现有资料看，墓葬最早出现在西亚地区，欧洲较之稍晚。而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已知最早的墓葬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18865 ± 420 ）年的山顶洞人已有埋葬的习俗^[1]。墓葬在出现之初即被赋予了诸多内涵，山顶洞人将死者埋葬在下室，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及一些陪葬品等，体现出原始的宗教及神鬼思想。新石器时代，以土葬为主的丧葬文化基本形成，瓮棺葬、椁墓等极具典型，瓮棺葬可能“表现了整个氏族对后代繁衍的极大关注”^[2]，椁墓则是当时墓葬形制的主流。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仰韶文化中期，首先在东方的海岱和环太湖地区出现了木质的棺或椁，并且从一开始，棺椁就与社会内部的分化密切联系在一起^[3]。仰韶文化晚期之后，棺椁的使用范围扩大，陕西华县发现的仰韶文化墓葬^[4]，山东日照东海峪^[5]和淄博市西朱封^[6]龙山文化墓地等发现的棺或椁均具有代表性。棺和椁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形成，之后竖穴椁墓渐成为墓葬的主要形式。东周时期，椁墓的筑造达到鼎盛期，与之同时大坟丘开始出现并逐渐普及^[7]。江苏丹徒北山顶^[8]、苏州真山吴王墓^[9]，河南光山县黄君孟夫妇合葬墓^[10]、固始侯古堆大墓^[11]等都是大型封土墓。至汉代，封建制度逐步确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趋于统一，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的墓葬都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较大发展。墓葬类型丰富多样，蕴涵内容十分广泛，丧葬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渐趋统一，但地域性的差别仍然存在，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地域性研究是综合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地域性研究不仅可以探讨地方文化的内容和特色，还可以从各地区找出共同点，为更加深入细致地进行整体研究提供较大帮助。

徐州是汉代重要封国的所在地，诸侯王、列侯墓葬发现较多，中小型墓葬更是不胜枚举。这些墓葬的发现、发掘为研究我国古代墓葬，特别是汉代墓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从而为汉代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墓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某个时期社会内容的反映与写照，综合研究徐州汉代墓葬可以对其所反映的汉代社会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也正是我们进行墓葬研究的目的所在。

第一节 徐州地理概况与历史沿革

一、地理概况

徐州位于东经 $116^{\circ}22' \sim 118^{\circ}40'$ 、北纬 $33^{\circ}43' \sim 34^{\circ}58'$ 之间，东西长约210、南北宽约140公里，总面积11258平方公里，属江苏省北部地区。该处陆路、水路极为畅通，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连通东西、南北经济的要地（图一-1）。徐州



图一-1 徐州在全国的位置示意图

(引自徐毅英主编:《徐州汉画像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1版,第6页)

地处黄淮平原的东部,域内除中部和东部存在少数丘陵外,大部分区域为平原。丘陵海拔一般低于200米,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9.4%。平原约占总面积的90%,海拔一般在30~50米之间,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降低,平均坡度1/7000~1/8000。低矮的丘陵山地和广袤的平原为汉代墓葬的修建提供了良好场所。

二、历史沿革

徐州自古为九州之一。先秦著作《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吕氏春秋》等均有记载。今天的徐州不同于作为九州之一的徐州,是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地级市。远古时期,很多生物已在此繁衍、生息。20世纪50年代以来,徐州地区发现很多古生物化石,如睢宁张圩油坊磷矿区发现的中国猫、印度熊、羚羊、蝙蝠等化石^[12]。

旧石器时代,徐州一带已有了人类活动,新沂黄墩乡何庄村遗址发现有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石核等,距今约一万年^[13]。徐州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经正式发掘的主要有邳州大墩子^[14]、刘林^[15]、梁王城^[16],新沂花厅^[17]、小徐庄^[18]、三里墩^[19],徐州市内的下圆墩^[20]等遗址,基本属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类型,并体现出不同的社会过渡特征。

今徐州古称彭城。“彭城”较早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夏六月,……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部,取幽丘。同伐彭城。”“秋,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冬十

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彭城名称源自大彭国，彭部落是江苏省境内较早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部族之一，而彭部落原应是下圆墩遗址的居民^[21]。彭祖所建之大彭国在夏代比较强大。商时大彭国为方国，其势尤强。武丁时期大彭国被灭，这与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相关甲骨卜辞的记载也较相符，其中一片甲骨卜辞有“辛丑卜，亘贞：‘乎取彭?’”的记载^[22]，说得是商王武丁在辛丑这天让亘占卜，灭大彭国能否成功。

西周时期，彭城属于宋国。至春秋时期，徐州开始成为诸侯争夺的目标。从公元前573~前223年，彭城在几易其主后终归于秦。期间，楚统治今徐州地区的时间较长，因此有较多楚文化遗存，最典型的如邳州刘林发掘出土有“西琳簋”铭文铜器组的战国墓葬^[23]。

秦统一后，今徐州一带属泗水郡和东海郡管辖，设彭城县。楚汉时，项羽建都彭城五年，今徐州地区基本属项羽西楚管辖。汉五年（公元前202年），韩信被封为楚王，都于下邳。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同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七国之乱后，楚国封域被削减，今徐州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归属东海郡和鲁国。东汉时，徐州大部初属楚国，后属改封的彭城国，二者均建都彭城。另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属沛国，东南地区隶属于下邳国，下邳国都于下邳（今睢宁县古邳镇）。

三国时，曹操迁徐州刺史部于彭城，西晋时仍设徐州刺史。东晋时，彭城郡辖彭城、吕、蕃、薛、留五县。之后至隋统一，徐州分属不同政权，名称与辖地也有所不同。隋至唐初继续沿用北周时所设徐州总管府，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徐州为彭城郡，辖彭城、萧、丰、沛、滕、宿迁、下邳。之后至北宋，徐州置武宁军节度使。金灭北宋，徐州属金统治。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降徐州为下州，彭城县并入徐州，徐州仅辖萧县一县，属归德府汴梁路。1348年，徐州又升为总管府。明初，徐州曾直隶京师，后属南京。清初，徐州先后为江南省和江苏省所属直隶州，雍正末年升为徐州府，析置铜山县代替彭城县。徐州府驻铜山县，辖领一州七县（丰、沛、萧、砀、铜山、邳州、睢宁、宿县）。

民国初，徐州府废，后曾设徐海道，治所在铜山（徐州）。日伪时由铜山县析置徐州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仍置徐州市，属江苏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留徐州市，初为山东省辖市，后划回江苏省，同时成立徐州专区，驻徐州市。此后，徐州市和徐州专区并存，不同时期辖属有所变化。1983年，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撤徐州专区，将所辖六县划归徐州市。徐州市现辖的六县（市）分别为丰、沛、铜山、睢宁县和邳州、新沂二县级市。这些县市多数历史悠久，一些县市如铜山、睢宁、邳州、新沂等，地下文物埋藏丰富，遗址、墓葬数量众多。

第二节 徐州汉墓的发现与研究现状

汉代墓葬是徐州地区考古的重点，也是研究徐州地区汉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按汉制，有封地者死后葬于封地，所以汉代被分封至徐州一带的诸侯王及其宗室、子孙等多葬在徐州周围，加之封国内的官僚、地主、平民百姓等的墓葬，徐州境内汉墓数量众多。

一、徐州汉墓的发现与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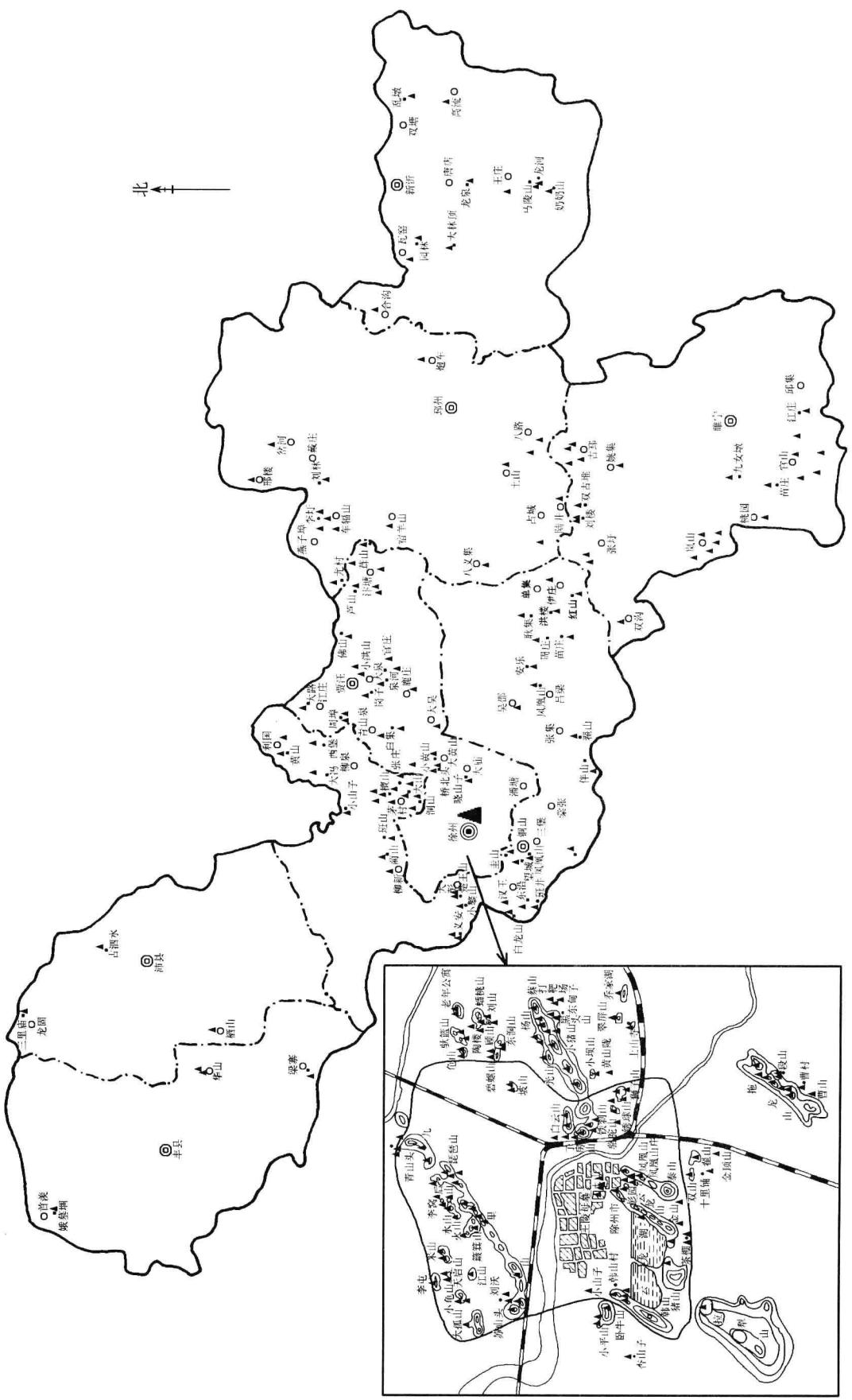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给我国考古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外考古学家们相互协作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20世纪前半叶，由中国西北探险考察及其简牍研究肇其端，稍后东北等地汉墓的零星发掘，标志着近代考古学意义上的秦汉考古的开始^[24]。就徐州地区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前，科学性的考古发掘基本没有，虽有零星的汉墓被发现，但均未经正规发掘。如清代末年，沛县古泗水出土有画像石，石上“人物车马悉合古制”。民国初年，张伯英先生常于“石刻旁搜到墓冢”，收集到包括双沟“牛耕图”在内的很多画像石，但张先生对出土这些画像石的墓葬基本没有记录^[25]。

新中国成立后，徐州地区的考古事业才真正起步。1952年，铜山县茅村乡发现一座汉画像石墓，2月，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山东省文管会联合发掘，这是针对徐州汉墓的第一次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亲自前往，并第一次发表了清理发掘报告^[26]。1952年底，徐州划归江苏省，为省辖市。由于考古力量匮乏，之后的一二十年内，考古工作基本由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与徐州地区文化部门合作开展。1950年代发掘清理的汉代墓葬主要有睢宁九女墩汉墓^[27]、铜山洪楼汉墓^[28]等，铜山县洞山村还发现有竖穴石坑墓^[29]。1960年代发掘清理的墓葬主要有黄山陇东汉壁画墓^[30]、青山泉白集汉墓^[31]、徐州十里铺汉墓^[32]等，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有瓦棺墓（M68）^[33]。

20世纪70年代，徐州汉墓考古步入全面发展阶段。1970年7月，南京博物院对土山一号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银缕玉衣^[34]等一百多件文物，证明了土山非亚父（范增）冢，而是东汉彭城王或其夫人墓^[35]。1977年5月，在一号墓南又发现了二号墓，2002年在一号墓西北发掘了三、四号墓，三号墓规模较大^[36]。这一时期还发掘了较多西汉墓及东汉画像石墓，西汉墓葬如小龟山一号墓^[37]、子房山汉墓^[38]、奎山汉墓^[39]、沛县栖山汉墓等^[40]，较具代表性的东汉画像石墓如新沂瓦窑^[41]、邳县燕子埠^[42]汉墓等。

1980年至今，徐州汉墓考古收获更多。一是众多大型诸侯王（后）墓被调查发现和发掘，其中有8处近20座西汉刘姓楚王墓，一定数量的下邳王墓，同时还对部分墓葬的陵寝建筑、陪葬坑及陪葬墓等进行了考古调查和相关发掘，成果颇丰。这一时期还有较多等级较高的中型墓葬如宛朐侯刘埶墓^[43]、火山刘和墓^[44]、翠屏山刘治墓^[45]、韩山西汉墓^[46]、苏山头汉墓^[47]、天启汉墓^[48]、拖龙山M1、M2^[49]、M3^[50]、李屯汉墓^[51]、徐州市凤凰山汉墓^[52]、东甸子汉墓^[53]等被发现、发掘。等级低的墓葬发现更多，很多以墓群的形式出现，如市区铁刹山汉墓群^[54]，贾汪区大路汉墓群^[55]、官庄汉墓群^[56]，铜山县翟山凤凰山汉墓群^[57]，睢宁县半戈山汉墓群^[58]，邳州市山头东汉家族墓地^[59]，新沂市乱墩汉墓群^[60]等。其中铜山县翟山凤凰山发现汉墓近20座，铁刹山发现20多座，官庄汉墓群约有50座，大路汉墓则有202座。墓群时代不一，有的时间跨度还较长。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徐州汉墓已经有相当数量，据李银德先生2006年统计，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墓将近2000座^[61]，2006~2009年，徐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及其他相关单位又清理发掘了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因此截止到2009年底，徐州一带已发现、发掘汉代墓葬的数量应在2000座以上（图一-2）。



图一-2 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汉代墓葬分布示意图

总的来说，徐州地区汉墓资料相当丰富。这为我们综合研究徐州汉代墓葬与社会内容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实物资料，同时对研究全国汉代墓葬也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徐州汉墓研究概况

徐州地区发现、发掘了大量汉代墓葬，但徐州汉墓的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与我国汉墓研究的整体状况相比较为滞后，可以说徐州汉墓研究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环。关于徐州地区汉墓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具体来讲，应是1952年茅村东汉墓发掘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徐州汉墓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目前整理和认识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徐州地区已发现、发掘很多汉代诸侯王（后）墓，虽有一些简报发表，但正式报告仅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一书。它是目前徐州地区唯一一部汉代诸侯王墓的发掘报告，对研究汉代诸侯王墓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汉墓资料激增，为汉墓研究提供了可能，除一些简报和相关报道外，还有一些专门的汉墓报告，特别是包含众多中小型汉墓的发掘报告，如《洛阳烧沟汉墓》^[62]、《广州汉墓》^[63]、《西安龙首原汉墓》^[64]、《长安汉墓》^[65]、《白鹿原汉墓》^[66]、《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67]、《萧县汉墓》^[68]、《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69]等，数量较多。这些报告不仅为研究各地区汉代墓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在编写过程中利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地对本地区的汉墓进行了深度研究，反映出汉墓的地域性特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徐州中小型汉墓的发掘报告或简报不仅与全国其他地区有差别，而且与已发现和发掘的墓葬数量不相符，小型墓葬尤为明显。具体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画像石墓的发掘简报较多，与这一时期画像石墓被大量发现有关。80年代中期之后，西汉墓的简报数量增多，但报道的多数为等级相对较高或保存较为完整的墓葬，等级低或破坏严重的墓葬及墓葬群资料公布较少。中小型汉墓的大型发掘报告仅有《邳州山头东汉墓地》一书，该报告对2006~2007年发掘的邳州山头45座东汉墓葬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就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70]。可以说，墓葬资料公布不全面，大型发掘报告较少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徐州汉墓研究的进展。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徐州汉墓资料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西汉墓，墓葬的分期甚至对一些墓葬年代的推断主要是借鉴中原地区汉墓的相关认识进行类比推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90年代之后，徐州汉墓资料大增，尤其是西汉墓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特点，对于徐州汉墓的研究也相应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徐州汉墓，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为李银德先生的《徐州汉墓形制与分期》^[71]、王恺先生的《徐州地区的汉代石椁墓》^[72]等。《徐州汉墓形制与分期》一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徐州地区发现、发掘的汉墓形制、分期及随葬品组合变化等进行了论述，是徐州汉墓研究中一篇重要的文章。除上述论文外，周学鹰先生的《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一书中对徐州汉墓的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3]。但就总体而言，综合性研究还是较少。